評介布拉克著
「現代化的動力：一個比較歷史的研究」

郭　正　昭

書名：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著者：Cyril Edwin Black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

出版：Harper & Row, New York, Evanston, and London, 1966.

頁數：共二〇六頁，本文一九九頁，索引七頁。

價目：美金五元九角五分。

㈠

近年以來，學術界有關「現代化」的研討，顯然已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嚴肅關切現代化問題者，不僅限於少數獨具慧眼與悲天憫人的哲學巨匠，幾乎所有人類文化的前驅者，包括專業性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學人，也被迫把他們的集體努力，投注到這一領域，而形成大規模的，整合性的「現代化」的探討運動。廣泛參與此項運動的學者，至少有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以及歷史學家。他們相互切磋觀摩的結果，乃發覺這個新領域所涉範圍至為遼濶，殊非任何一家單獨的研究能力所可企及；他們感悟到各科智慧的交融，為事實所必需，於是「科際研究」（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遂成為這個新知識領域的一項特色。又因為現代化的研究，需要援引近代史實做論據，以建立實證基礎，來修正、補充或強化社會科學家所型塑的抽象而寬泛的理論概念，於是「比較歷史」（comparative history），乃變成一種有效的工具，倡行一時。由於科際整

合與比較歷史的綜合運用，現代化研究遂呈現了嶄新的面貌，使得西方學者逐漸不再爲狹窄的「西化」或「歐化」的傳統觀念所囿限，漸能擺脫模倣論的主客地位觀的牢籠，並超越「原創地內在性」（primarily internal）與「累積地外在性」（increasingly external）等二分法的藩籬，而開始以世界性的眼光透視現代化的整體現象，從而提供普遍的原則，並容許普遍原則下各區域個別性的存在。在這一前提下，評者對布拉克教授所著「現代化的動力：一個比較歷史的研究」一書，特予重視。因該書爲此一嶄新研究趨勢與潮流之下的產品，是一部科際整合與比較歷史的代表作。

本書著者布拉克，出身哈佛，曾任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及行爲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現任該校講座教授，主講比較歷史。他是俄國史專家，對歐洲現代史尤擅功力，著有：「保加利亞憲法政府的建立」(Establishment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Bulgaria, 1943)、「東歐的挑戰」(Challenge in Eastern Europe, 1954)、「新俄國史」(Rewriting Russian History, 1956)、「俄國社會的轉變」(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Society, 1960)、「共產主義與革命」(Communism and Revolution, 1963)、「廿世紀歐洲史」(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A History, 1966)、「現代化的動力」(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1966)、「世界政治的中立化」(Neutralization in World Politics, 1968) 等書，在美國史學界頗負盛譽。閱歷甚豐，曾任「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雜誌的主編，美國國務院駐東歐外交官，聯合國希臘邊界事件調查委員等職，是一位兼具行政長才的學者教育家。

本書寫作，前後共歷八年。一九五九年，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召開一項政治現代化研討會 (The Conference on Political Modernization)，著者在會中提出一篇論文：「政治現代化的歷史透視」(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本書一些思想要點，即胎源於此。至一九六〇年底，著者在維吉尼亞大學詹姆士、理查講座 (James W. Richard Lectures) 主講比較歷史，因爲教學需要，乃寫成本書初稿。一九六四年春季，著者曾在普大本部主辦的威德斯普講座 (The Witherspoon Lectures

）研討本書的幾項理論概念。一九六四年底，美國歷史協會歐洲現代史組（The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Section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在華盛頓開會，著者又在會中宣讀本書第二章第一節「比較的方法」。至一九六六年，本書乃正式委由普大國際研究中心負責出版（見著者自序）。

㈡

本書共分七章，二十五節。第一章現代化，包括：前言——革命時代的挑戰、現代化、傳統與現代、現代化的痛楚，其主旨在闡述現代性的特徵，而此一特徵是遍及全球的；並且概略探討了各國在以傳統結構適應現代功能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與難題。第二章比較歷史，包括：比較的方法，現代化過程的討論、現代化社會的比較，以比較的方式，將人類現代經驗的總和，歸納出普遍的法則，同時研析與此相關的各項問題。第三章現代化政治，包括：政治與現代化、政治領導階層、現代化的階段、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以編年的方式，考察現代化的過程，且特別提出各國在現代化時，必需經歷的幾個重要階段，諸如現代性的挑戰、現代領導階層的鞏固、經濟與社會的轉變、社會的整合。第四章現代化的比較，包括：比較的標準、政治現代化的七種類型，以比較的眼光，將面臨現代化衝擊下的一百七十五個社會，劃分為七種重要類型。第五章現代世界的展望，包括：現代世界政治局勢、現代世界的觀念、國際整合的類型，分別討論了國家的、地域的、國際的三種類型的整合運動，比較其利弊得失，及其實現的可能性。第六章現代化與政策，包括：歷史與政策、變化的範疇、不穩性的範疇、國際行動的基礎、國際協議的形成，研究現代化對國際政治關係與未來政治局勢的影響。第七章現代化的研究——一個書目及其簡介，包括：世界歷史的多樣性、對人類的關切、現代化的觀念、比較的問題，臚列歷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研究現代人類發展的現狀，以及他們在史觀與方法論等問題上的歧見，並檢討現階段現代化研究概況及一般趨勢。著者徵引有關現代化之歷史的或理論的著作，幾達兩百種，從這一書目所提供的視野，便可以窺見現代化研究，無疑是二十餘年來，橫掃全球的學術運動了。

以下評者擬以摘要方式，闡述本書精粹的見解，然後加以補充或批評。

著者在此一高度解釋性的著作中，首先以生動的筆調，沉重的心情，描述現代化之嚴重的歷史背景。他認爲近代世界各國，無不在盡力應用日新月異的科學與技術，去解決人類生存的問題，因而導致了人類史上一個新的劇變。此種轉變，固爲人類生存環境的改善帶來前所未有的美好遠景，同時也給予人類前途想像不到的嚴重危機。研究此一劇變的需要日益迫切，因爲倘若我們不能迅速瞭解並控制此鉅大的轉變動力，人類即將面臨噩運。故如何有效控制這一劇變的進行過程，是今日世界政治文化的中心論題。這也是人類在生存與毀滅的抉擇中，最後的一個籌碼。唯有深切瞭解此種轉變動力的人，才能善加引導，使其走向造福人類的康莊大道（頁一）。

這種轉變所涉範圍之廣與影響之深，唯有人類史上另二次劇變可堪比擬。其一爲歷經極漫長的演化以後，在距今約一百萬年前，人類在地球上出現。人類史上第二次劇變是人類社會由原始轉向文明，其過程大約距今七千年至四千年之間，人類發展出有組織的農業生活，且具有複雜而深奧的觀念（頁一至三）。現今人類遭遇的劇變，其重要性決不亞於人類的出現，與由原始跨入文明的上述兩大轉變。它是人類史上各種劇變中最驚心動魄的一次。科學革命以來知識的高度成長與人類爲適應新知識而作的空前努力，是現代的兩大特徵。人類第一次意識到這種不知是禍是福的劇變，乃關係整個世界的命運，因此人類今天面臨的最大問題即是如何承受此一挑戰而能避凶趨吉（頁四）。

在這一嚴重的歷史背景之下，著者進而努力澄清現代化觀念的紛擾。他認爲「現代化」一詞的涵義，應指近世紀以來，知識的加速擴張而發生的創新過程中的動態形式；其特殊意義，不僅在於動態的特性，且在於其對人類的全面衝擊。換言之，「現代化」乃意謂科學革命以來，人類智識不斷增進，傳統社會制度逐漸演化，以適應新功能，並加強對環境控制的一種變遷的過程（頁七）。此一過程的內涵至少應包括五個層面：

一、知識的：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自然科學發展，人類尋找對大自然與人文社會現象的理性的解釋，這種態度使得知識的追求成爲現代化過程的重心。知識變革中另一項重要的事實是科學透過工藝的運用更爲實用化，農業、醫學、交通等發

展，使科學大量改善物質生活環境。而科學化也影響到價值觀。根據舊日淺薄的自然知識產生的宗教理論和信仰，現在都需要重新檢討了。近代偉大的文學作品，便是有關社會變遷，新舊價值的衝突，以及人在這劇變的世界中的命運。人的本性、幸福與展望等問題的探討，成了現代文化的中心思潮。而懷疑精神及研究方法，促進了知識無限的快速擴張。這是一個知識高度發達的時代（頁九至十三）。

二、政治的：由於交通與傳播技術的革命，一個領導中心才能有效指揮屬下的龐大機構，深入控制遼濶的地方，因此政治方面的現代化是國家職責擴大而中央政府獨攬大權。民主還是典型的政治方式，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及選擇政府首長與政策的權利，法治與人權受到較多的保障。但另一面，在現代化的控制之下，施政機構的權力逐漸增加，且有益形專業化的趨勢。國家將可能透過傳播系統及教育方法，來徹底控制人民的思想行為（頁十三至十八）。

三、經濟的：現代化的經濟發展，特徵之一是儲蓄與投資。政府、銀行、企業機構和個人，都同時在儲蓄和投資，生產事業如交通、原料、工廠及重工業的大量投資，導致生產量的激增。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是科學和技術的革命，這種革命直接帶來了專業化與分殊化，間接擴大了物品和勞力的交易範圍，使得各種人才和物資結合成相當緊密的經濟體系，古老的自足式的農村經濟逐漸消滅了。而經濟發展與政治領導階層的決策密切相關，又構成了自由經濟與統制經濟的分野（頁十八至二十）。

四、社會的：跟着知識、政治和經濟的轉變，社會也起了很大的變化。農村人口大量向都市流動，而農村式的大家庭變成了核心式的小家庭。都市化以後，教育、就業機會及收入比較平等，男女間的關係也有顯著的改變，女性在法律和社會上享有同樣的機會和責任。廣大的傳播網對結合社會有很大貢獻，現代人經由媒介獲得大量新知識。由於醫藥和衞生設備的進步，死亡率大減。在機械的協助下，勞力和手工較少。而大量生產、累進稅法和社會安全制度又降低了收入的差距。由於上述各種變化，更促進了都市化的社會活動；而人力、物力大量集中行動的結果，國家觀念增强了，相對的是鄉土觀念淡薄了。社會流動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意義是鼓勵民族主義，促進國內經濟和社會的融合，形成全國一致的觀念，從而使國家的重要

性超越了個人（頁二十至二十四）。

五、心理的：舊式社會固定的生活方式抑制了個性的發展，多數農人從來沒有企望要改變他們的職業，其他行業也代代相承。一切顯得平穩，人民行爲方式歷久不變，即使在戰爭和遷移時也未嘗稍改。固然，每一個時代，個人都有些掙扎，有時是內心的，有時是人際的。到處也都有見識廣博和富於經驗的老成者，每一代也有一點新發現，社會也有一點改變，另外還有各種反抗和遷移，這種種證明舊社會還是有騷動。但一般人安身立命的生活環境狹小，接觸的人不多，因此養成了對人對事的偏見，容易仇視一切陌生的人物和新穎的風格。現代社會則比較缺乏舊社會的靜止、閉塞和穩定。工業化、都市化的結果，使農民大量湧進城市，工匠變成經理，傳統的階級觀念打破了，宿命論被揚棄了。社會變成了一個動態的社會，個人變成了獨立的個體，現代人充滿了改變的野心，他們從舊社會中繁雜且扼殺個性的風俗習慣和迷信中解放出來。他們成功的條件是優良的適應力、創造力和靈敏的移情能力（頁二十四至二十六）。

從本書上述一些簡單的解析中，我們不難覺察到現代化是人類以混亂及痛苦的代價，來換取新機會及新期望的過程。建立新生活方式時，無可避免的要摧毀舊的生活方式。現代化是在新環境內融合各社會，同時也在分解舊社會。傳統制度與傳統價值的崩潰是現代社會的病徵。現代人對常態與價值的懷疑，取代了舊日對傳統文化的堅信，舊社會的道德力及約束力是削弱了，人際關係日形疏遠。這種人際疏離（alienation）的本質是社會中個人人格的否定（impersonality）。現代化使得社會各份子孤立起來，剝奪了各份子追求自我人格形成（individual fulfillment）所必要的社羣意識與歸屬感（the sense of community and belonging），於是社會解體的各種因素——犯罪、少年問題、離婚、自殺、精神病——亦日形增多。這種個體普遍不安和焦慮的現象，就是所謂的在急速變動的社會中，個人的「自我迷失」。

另一方面，現代化在政治上的統合與集中，對個人及社會結構的傷害特別嚴重。一旦國家獲得了獨立，藉以達成統一及獨立的現代動力——民族主義，很容易就變成反動的保守主義及壓迫與鉗制人民的力量。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像現

代一樣，充滿了暗殺、內戰、宗教戰、國際戰，以及不同形式的大屠殺與集中營。現代化劇變中所形成的人類的偏激性格，是上述大部份暴行的原因。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時期，政治領袖一定會捲入暴行與較長時間的內戰中。國內的暴行是為强化國家權威，鎮壓叛亂，及推翻政府等而產生；在國際方面，大帝國的崩潰，被奴役人民的解放，領土結合形成的新國家，新舊國家安全的保障等，皆與暴行發生牽連。在民族情緒的籠罩之下，個人為有目標的領袖放棄他的自由，因而造成了大規模的，狂熱而盲目的羣衆運動，這是現代社會暴行與禍亂的根源。

教育文化方面的隱憂也不少。在一個整合與大衆化的社會（integrated and mass society）裏，文化如何保持品質的水平，是一個嚴重的難題。已有許多學者提出下列的疑問？

(1)如果每個人都必須受教育，則高水準的教育能否存在？

(2)如果理念與價值標準必須以每個人都懂的方式表達，此等理念與價值標準是否會因而變質？

(3)如果每個人均能發揮其影響力，則民主政治是否可行？

上述這些困境，就是著者筆下現代人所面臨的痛楚（agony）。如此看來，現代化過程同時具有創造性及毀滅性。不論從人際關係與國際關係間的問題上來看，新社會不會比舊社會更自由；不論從狹義或廣義上說，新社會不會比舊社會更文明。固然，新社會擁有對周圍自然與人文環境更深的瞭解，更能確保人類的物質享受，然而，新社會有更複雜的個人與社會問題，且擁有更大的產生暴行與毀滅的力量（頁二十六至三十四）。

(三)

現代化普及全球的經過非常複雜，要想了解現代性的成長，著者認為從政治方面來研究是一種有效的方法，因為政治發展比較容易確定，而且較適於供人做分析、比較與分段研究。變化是歷史的本質，而人物是創造歷史及表達各種趨向與活動的原動力。從這一觀點出發，著者乃信持了「伊力特主義」（elitism），特別强調政治領導階層的重要性。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及政治學家，一般都用「伊力特」（elite

）這個詞彙來稱呼一個羣體中擁有最後決定權及最受尊敬的人。「伊力特」較「領導階層」的意義要深刻，但著者則以「政治的伊力特」(political elite) 與「權力的伊力特」（power elite）作爲「政治領導階層」（political leadership）的同義字。他相信在現代化過程中，一個決心現代化的政治領導階層是不可少的條件，而政治現代化中的領導階層又可分爲兩大類型：

第一類是有權力的傳統領導階級。他們有權力說他們繼承的政治系統已不合時代，也有權力馬上做劇烈的改革。但這一類改革者的背景使他背負了傳統的包袱，他遲早會覺察到他改革的是自己，他的家族，他的特權，他將摧毁他在傳統中所享有的優越地位。因此，這種由上而下的改革運動，雖然影響廣遠，但却往往流於局部性的、保護性的、防禦性的及貴族性的，而且通常都半途而廢。

第二類領導階層是對有權力的領導階層心懷不滿的人，其中又可分爲兩種：一爲出身於傳統政治領導階層的失意份子，他們決心追求現代化，動機之一是藉現代化作爲鑽營的手段，企圖在變動中奪權。另一種是知識份子、律師、醫生、商人，或新式軍隊中靠軍功晉升者。他們自認對社會有很大的貢獻，可是却沒有參政的權力，他們有「沒有代表權就不納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想法。這也就是現代化領導者以及熱中極端革命計劃的份子都不是農人、工匠或勞工的原因（頁六十四至六十五）。

以「伊力特主義」爲基礎，著者進而提出了他的現代化的「四階段論」，爲本書理論架構重點之一。他認爲世界上現存一百七十五個獨立或非獨立的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都面臨了强大的壓力和慘烈的衝突。他們必然會經歷到下面四個階段：

一、現代性的挑戰：這是舊社會第一次接觸和認識到現代化，並擁護現代化的現象。最先發展新知識與新技術者是傳統的「伊力特」——在西方是少數的大地主、僧侶、商人與工匠。而最先現代化的歐洲國家，在近代一開始時便發揮出世界性的影響力。到十五世紀末期時，他們已發現了美洲，搜索過非洲大陸的海岸，並加强了與東地中海與亞洲社會的接觸。從這一點看來，現代化的挑戰，一開始便幾乎遍佈全球。不過這種現代化與傳統的接觸只是浮泛的、表面的，直到十八、十九世紀以後，現代觀念及習慣始深入影響政治、經濟與社會（頁六十八至七十一）。

二、現代化領導階層的鞏固：這步驟可能是和平轉移政權，也可能透過革命手段。往往要經過百年革命性的鬬爭，才能使傳統領導階層的權力轉移到現代領導階層手中。這是整個政治現代化過程中最危險的一段。政治革命、農業改革、建國等基本改變，在各國發生的形式不同。許多國家爲了爭取獨立與保持獨立，付出了長期慘重的人力與物力的犧牲代價，而民族主義遂在人民心中烙下深刻的痕跡，這樣一來，現代化的發展就變了質。有些保守的領導者，便常利用民族主義來防止人民要求改革，在獨立之前要求自由的民族主義，在獨立之後往往一變而爲保守的力量（頁七十一至七十五）。

三、經濟與社會的轉變：由鄉村的農業社會轉變到都市的工業社會，其間產生經濟成長與社會變革。這是現代領導者取得政治力量，與社會趨向整合之間的一段時期。以國家爲本位的經濟與社會的轉變，不僅使政權中央化，也加强了民族主義。最明顯的轉變是勞動力的轉變，國內大部份的勞力由農業轉向工業、交通、商業和公職，而人口也大量由鄉下移往都市。此一轉變，爲社會帶來許多利益，如教育、醫藥的普及，參政權的擴大；但也帶來沉重的負擔。由農業轉向工業時的政策的不同，便是自由民主制度與國家主義制度的主要分野（頁七十六至八十）。

四、社會的整合：社會結構因經濟與社會的劇變而發生基本的變遷，並形成新的組織系統。在此一階段中，人民大量由鄉村移向都市，而原來的村里、鄉鎮、職業及其他羣體所構成的社會結構因此瓦解，變成以孤立的個人爲社會基礎的結構。整合後的社會，在政治權力的結構（structure of political power）上更趨健全。個人可經由固定的行政部門或專業機構發揮他固定的權力。統治階級擴大，決定職位高低的是能力而不是特權。社會生產力愈高，財富的分配愈均勻，個人升遷的機會平等，不再靠社會背景與家世了。在比較平靜而穩定的情況中整合的先進社會裏，維持活力的宗教信仰，愛國情操，以及別的傳統約束力量，都是維持社會秩序的主要因素（頁八十至八十六）。

如此整合後的社會，更能有效運用其人力資源，有足够的消費市場，國家收入增加，通才及專才教育水準提高，社會有安全的保障，有充足的休閒娛樂。但這只是指組織完善，功能健全的社會而言。社會愈機械化，在混亂或蕭條時，便會因大

量失業而癱瘓。同時個人只是社會中孤零零的一份子，需要獨自在冷漠的公私機構中謀職求生，於是孤獨、恐懼、人際關係的疏離等，遂往往剝奪了個人適應環境與心理安定的能力（頁八十一至八十二）。

「大衆化」（massification）是現代整合社會的特點，這一類型的社會常稱為「羣衆社會」（mass society）。有很多文章討論這種社會，分析最多的題目是「大衆化」的危險。害怕個人會湮滅在人羣裏，輕易地被煽動家所利用，成為破壞的工具；害怕中層政治結構與社會組織削弱以後，中央政府將獨攬大權，出現極權制度（totalitarian system）；害怕唯有最通俗的文化才能存在，其低淺的水準相等於少年閱讀程度；更害怕那些開出現代知識之花的少數具有創造性的天才人物，在流沙似的羣衆下淹沒，窒息而死（頁八十四）。

著者析論至此，乃進一步以大規模的比較方法，探討了一百七十五個國家，而歸納成七個現代化的類型。此為本書高潮，亦為理論精華所在。他將比較的標準建立在下列五個參考點之上：

(1)一個國家新舊政權轉移的年份，早於或遲於其他國家。

(2)現代化的挑戰來自國內或國外。

(3)此一國家現代化後，仍保持原有的國土及人口，或經過一番變動，澈底改變版圖與人口。

(4)此國家在近代為獨立自主國，或曾被他國殖民統治。

(5)此一國家在踏入近代時，是具有可以適應現代性功能的完整制度，或只有殘缺的制度，而必須輸入外國的現成制度來替代（頁九十六）。

由於採用比較歷史的觀點來研析各國現代化的情形，著者乃以上述五點作分類標準，而推論出政治現代化的七種類型：

(1)第一類型是最早現代化的國家，包括英國與法國。他們為後來者奠立了楷模。英國現代化主要始源於十七世紀清教徒革命，對傳統權威、舊秩序等的理性批判。而法國大革命原創性的影響，遠及其後一百七十五年的革命運動，為政治權力的內在轉型留下了典範。他們現代化的挑戰來自內部，且一直都保持原有的國土與人民。由於沒有強力的外國干擾，純以國內需要為依歸，因此變革的

進行非常緩慢，傳統的制度能在相當穩定與秩序的情況下，適應現代化的新功能。他們最先提供現代化的理論基礎，且最先將政權轉移到現代領導階層（頁一〇六至一一〇）。

(2)第二類型是英、法兩國在新大陸的子國。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直到十七世紀，這些國家的多數人民都是從舊大陸的母國遷移來的，因此他們所遭遇的政治現代化的挑戰，也可說來自內部，而得自母國的進步制度也足以適應現代性的功能。但他們都經過一段爲期不短的殖民統治，且經歷人民與土地的重整階段。這一類型的國家享有幾種特性，如經濟與社會的轉變過程是在流動的社會結構上運行，且地域遼濶，資源豐饒，在地緣上又富於獨立性，且繼承舊世界的自由制度，所徙入者又爲優越人民，這些有利的條件，使他們現代化的發展超過歐洲的程度。但他們亦有其苦惱，最嚴重的是同化問題。美國號稱「大熔爐」（melting pot），但黑人所帶來的双元整合問題迄難解決，種族的異己感與敵對性並未消融（頁一一〇至一一四）。

(3)第三類型是歐洲的二十三個國家。他們的政治開始現代化的時間比英、法要晚，且直接或間接受法國影響，故在法國大革命以後，現代領導階層才開始鞏固。這一類型的特色是他們都經過長久與激烈的領土與人民的重整期。他們具備了可以接受現代化的傳統制度，他們對現代思潮及制度的發展，甚至已貢獻了數世紀之久，在某些方面可媲美，其或超越英、法及美洲國家。這些國家自有他們的個別處境與問題，但社會與經濟的轉變則均發生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和二十世紀的前半葉，而艱苦建國的過程往往爲民族主義的激情所瀰漫，不僅損害了人權保障，且阻碍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是一個極端的例子（頁一一四至一一六）。

(4)第四類型是二十二個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他們是第三類歐洲國家的分支或子國。他們的人口以歐洲血統的移民占優勢地位，現代化受外力影響，標榜的國家目標，建立的政府形式都植基於自由歐洲的模型。他們獨立的成就並非樹立新領導階層的權力，而是造成一種新殖民主義，並藉以保有傳統的生活方式。歐洲血統人民的優越地位與財富與非歐洲的土著的低賤與窮困，加深了種族間

的鴻溝，限制了公民權的擴張，也影響到政治與經濟的發展（頁一一七至一一九）。

(5)第五類型國家的政治現代化沒有受到外力的直接干涉，但受到先進國的影響。這一類型的國家數目較少，只有俄國、日本、中國、伊朗、土耳其、阿富汗、伊索匹亞及泰國八個國家。他們的共同點是都有一個歷史悠久的中央政府，都能抵抗直接與全面的外來統治。比較起來，他們可說是自動現代化的，而且也都能保持相當完整的版圖與人民。本類型國家是舊政府領導者先面對現代化的挑戰，這些舊政府尙足以抵抗外力，不淪入先進國家的統治之下，最後覺悟非從事現代化的改革不足以救亡圖存。這些改革有一特性：不是改革傳統制度，相反的，是加強傳統政府的力量，以抵拒外來的侵凌與壓迫。傳統文化的向心力與認同感（cohesion and sense of identity），使本類型的國家在現代化外力衝擊下保持團結與完整，但傳統文化也以各種方式延緩現代化的脚步。這些國家在政治現代化方面是同類型的，但其他方面則區別很大。譬如，只有日本是不經由革命顚覆舊王朝，而於一九四五年由現代領導階層取得政權；其他國家的現代領導者均經過決定性的革命行動。就傳統的支配性而言，中國是最極端的例子，政治上及思想上的領導者都深信傳統價值，至一九〇五年，現代知識的地位才取代了科舉制度，甚至迄今大部份領導者仍信持「中國本位的世界觀」（sinocentric view of the world）（頁一一一至一二三）。

(6)第六類型包括三十四個現在已獨立的國家，二十九個非獨立國，他們有優良的傳統文化基礎，在接受現代化時能對他們的保護國產生互應。本類型中只有少數幾個國家有歷史背景，可據以建立民族國家。但大多數的國家，開始便由殖民國來劃分疆界，建立政治系統。他們後來即以這些行政區域爲根據，要求獨立。殖民統治時期，在保護的架構上仍具有自治的成分，因此這些國家現代性挑戰的本源，實際上是受到歐洲理念和制度的影響。香港、新加坡等均屬於此型（頁一二三至一二八）。

(7)第七類型包括三十一個獨立國，二十個非獨立國。他們在遭遇現代化的挑戰時，尙未發展他們的宗教、語言與政治體制，以致不能接受及適應現代化。本類

型的特點是缺乏傳統文化，在殖民統治下呈靜止狀態。他們有兩個大問題：在殖民地時期不能主動採取任何現代化行動；及至獨立，則又面臨一切現代化帶來的問題。也正因如此，他們更容易經由採擇而獲得現代制度，不必重蹈前現代化國家的覆轍（頁一二三至一二八）。

對於現代化的世界社會，以邏輯的方法推論，不難預測各先進國家互相依賴的結果，將是國際性的整合。這就是現代化的終站，也是我們現階段可以構想的終站。討論世界性整合的問題時，我們必需瞭解一點，非到二十一世紀大半過去後，世界上的多數國家，才能完成經濟與社會的轉變，而開始進入社會整合的階段。新的世界觀正日漸形成中，根據現況推測，人類將同時朝下列三個相關，然又相矛盾的方向發展，這構成了現代化國際整合的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國家的（the national）：世界上一百七十五個獨立及非獨立國家經由社會整合，而由傳統的生活方式轉變到高度現代化的生活方式。以整個世界而言，今日尚屬於現代化過程的初期。將來並不需要特別的外力，只待各國現代化後，便可自然產生國際整合。因為現代知識的普遍性，國際貿易的成長，人口與資源的流通，以及其他各項因素，都促使現代化的國家彼此依賴，而依賴的程度與現代化成正比率。

第二種是地域的（the regional）：藉幾個高度整合區域的發展，來作國際整合的媒介力量。美國、歐洲共同市場、蘇聯集團、大英國協，及日本，都可能擔任此一角色；站在現代化的角度來看，此種地域的核心不單是政治權力的中心，也是吸引資源與技術的經濟發展中心。先進國家整合的方法，可為此類型的範例。

第三種是國際的（the international）：由各國組成，並同意遵循國際組織而達到世界整合的目的。聯合國協調這些組織，並做為國際安全的折衝機構，對於國際合作時所發生的各項基本問題，提供了一個實驗與討論的場所。但它本身，却並未為整合而努力。聯合國憲章內清楚地載明，它不干涉會員國的內政問題，除非安理會認為該問題危害世界和平與安全（頁一四七至一五六）。

著者認為，展望現代化終極的大同社會（an ultimate modern world society）時，必需認識一點，此即歷史的經驗尚未提供任何充分的論據，可以指出大

同社會將以何種形式出現。世界上還僅有少數人生活在較富庶的環境裏，而這少數幾種環境之間的差異，只令人在預言未來時要格外謹慎。現代化是一個持續而複雜的過程。數十年前，一個廣泛的信念是，先進社會發展出來的特殊制度將自然地爲其他社會所採行，但徵諸事實，則迄今未見採行的跡象（頁一六一）。

最後，著者以結論性的語調指出：在未來的年代裏，人類將遭遇的世界性問題是，如何使各種不同的傳統制度適應現代化的功能，處理發展過程中的不穩定，建立國際性行動的基礎與形成國際協議。在這些複雜工作背後，是前所未有的劇烈變動，威脅到一切既存的價值，摧毀維持穩定的舊有行爲方式，與爆炸性知識的微妙平衡。領導者必需在限制暴亂範圍的國際組織下尋求一個辦法，使各種傳統的結構適應現代的觀念與制度。能够成功地解決這些問題的領導者，才有資格決定將來的世界形式（頁一七三至一七四）。

(四)

從上述簡介的內容提要中，可知本書及其著者所硜硜努力者，乃想從比較歷史的觀點尋求現代化的理論架構，並試圖運用科際整合的研究方法，綜合解析歷史變遷，此爲本書特點，亦爲著者一大貢獻。這種理論架構的建立與科際研究法的運用，雖未盡善到無懈可擊，但大體上是成功的，在「現代化」研究途程的推展中跨越了一步。最值得注意的是本書運用比較法而建立了「功能觀」與「演化論」，打破了現代化的「三段論」與「兩極說」。

歷史的比較研究並非一門新鮮的學問，譬如人類學家巴葛第（Bogardus），在他的「文化與歷史」（Culture and History, 1930.）一書中，即曾對世界幾個大文明做過比較研究。但巴氏重點置於精神和價值觀念的比較研究上，而本書的重點則放在各地區不同社會的結構與功能上。著者曾探討比較法在歷史研究中的特殊用途。他認爲比較法有兩種相互關連的目的：

第一、以比較法將複雜的資料重新組織與分類；

第二、用來做較富動態的說明。

兩者主要的區別不是在於方法的不同，而是在於比較對象有所差異。比較法用於組

織時，强調制度與形式；用於說明時，則主要討論原因與影響，因此比較完全指向「概化」（generalization），其危險性是太重視歷史事件的「單一性」（uniqueness），故運用比較法，必須注意時序關聯、實體界定、證據運用，與結論的形成。當比較的問題公式化時，一個重大的區別是結構與功能。以研究功能的方法著手，學者可認爲現代化是一種傳統結構適應現代功能的過程。這是一種非常有效的討論方式。功能觀（functionalism）最常用來分析系統的作用及闡述系統中各部門功能間的關係。研究現代化時用此種著手方法的好處，在於它能將社會系統當作有機體，而去分析各結構對維持系統生存所發生的作用。將社會當作有機體而研究其功能時，可引起許多有價値的問題供人做觀察分析。這些問題之解決可澄淸人類行爲中複雜的關係。

但功能研究亦自有缺陷。功能觀容易趨向中庸的態勢與均衡的偏見。行爲科學中的功能觀尤誇張知識論與目的論，而忽略了社會中非理性的，多變化的因素。而劇變爲現代的特徵。此劇變的根源是知識的成長，並因此使社會結構受到衝擊。具有强力的知識創見，政治整合，經濟成長，社會流動，人格適應等，是現代化的特徵。社會結構爲求適應上述之變遷，本身必須澈底調整。同時功能亦常會受個人的影響而整個轉變；技術革新，新自然法則的發現，新觀念的產生等，均使社會功能發生轉變。但著者相信，比較方法的缺失與作有效推論的局限，絕不應抑制現代歷史對人類整體的廣泛研究。不久以前歷史學家尚不敢以整個歐洲爲研究對象而求取結論，他們僅敢研究一個國家。現在則已經到了應該對現代人類整體形成結論的時候了。不論比較對象是政治團體、政治制度或政治過程，系統與觀念皆不重要，主要是它們應有歷史實質（historical reality）。這樣形成的結論不能做爲所有過去、現在、將來問題的答案，但可使歷史學家對現代世界有較深的理解。

社會科學家探究現代化錯綜複雜的特徵，其研究方法在理論上雖依循各種不同的途徑，但多少均導向「理型」（ideal type）的概念。理型的概念是近代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的重要貢獻，而爲現代社會科學家應用於社會型態之分析。事實上，當研究者企圖列舉現代社會的特徵時，便意謂「現代社會」理型的存在，也即同時暗示與此對立的「傳統社會」的存在。社會科學家廣泛運用「理型研

究法」（ideal type approach），而構成現代化的三段論：「傳統的——過渡的——現代的」（traditional-transitional-modern）。這種三段論有幾項嚴重而明顯的缺點：如社會科學家在研究社會變遷時使用模型（model）的情形一樣，它往往表達一種錯誤的傳統社會的映象，也卽誇張了靜態的、神聖的、未分化的傳統社會的性格。事實上，有許多傳統的社會系統，具有典型的現代結構、屬性和取向；反之，現代的社會系統，也有典型的傳統社會結構的特徵。其次，理型研究法假定，傳統性與現代性這兩極之間的運動是，而且應該是不能倒逆的，是有一定方向的，而且是單線發展的。因此，它不容許在現代化過程中有社會的「崩潰」或「退化」。徵之歷史，這顯然不符事實。其三，理型的觀點，意謂政治系統的發展到現代爲「終站」，因爲其所採納的當今之世的現代性的觀念，暗示再也沒有更進一層的社會發展。所以這個觀念等於一筆勾消了演化的現代化觀念。

在這個理論關鍵上，演化論對社會現代化的研究打開了一道活門。演化論的觀點把政治現代化的觀念從時間上（十六世紀迄今），和空間上（僅限於西方文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它克服了「現代社會」這一觀念所含具的「終站」意義，並且廻避了「現代後期」的社會發展的觀念。抑有進者，因爲演化論把政治現代化看做一種持續不斷的發展過程，因而鼓勵了比較的趨勢分析（comparative trend analysis）。這種觀念上的重新界定與方法論的再調整，深受人類學的影響。本書所尋求的理論架構，卽表現了比較的趨勢分析與演化論的優點。故著者極力讚揚人類學家對現代化研究的貢獻，他認爲：現代化已經成了人類整體的問題。過去學者許多最富戲劇性的方法之一是，以一種有先定目標的觀念或理論架構，做爲研究人類整體問題的方法。另外亦有某些歷史學家做文明的比較研究，希望能探尋出一種歷史模式。這種研究方法，同樣引起許多爭辯，但却極少有助於了解歷史，因爲他們不曾揚棄或克服由民族及科目而引起的偏狹之見。人類學家在這方面嘗試做科際整合的努力，因而導致了一項創始性的貢獻。他們對原始生活感到興趣，使得他們與世界各地的民族有了接觸。人類學是將人類整體做爲研究對象的第一種社會科學，並且也是第一種在人類事務上探討普遍性，而較少探討特殊性的社會科學（頁一七七至一七九）。

受了人類學的啓示和影響，歷史學家的視野也漸漸從地域性的，朝代式的和國家式的，走向人類社會的全景。

運用比較與科際整合的方法，著者研究的成果最主要是上述「四階段論」與「七類型說」等理論架構的建立，同時提供了現代化的「功能觀」與「演化論」，已如上述。不但要認爲現代化是由傳統性到現代性的變遷過程，而且要認爲它是由古代到無限的將來這一無窮延續中的一部份；在應用傳統與現代等抽象觀念時，只認爲這些觀念是整個歷史動態中一個單一的結構。將現代化認爲是一種變化的過程時，則可同時將其視爲知識成長並影響人類行爲時所出現的連續不斷的變化系列。而現代知識效果，就是改變了舊社會所擔負的功能，因此影響到舊社會的本身結構；這樣說來，現代化功能的中心目標就是改變舊社會的結構型態。這一現代化觀念的澄清與理論架構的建立，評者認爲是極具開拓性的。

本書另一特點是，以博洽的人文精神，提供人類全景的樂觀展望。著者於「現代化的痛楚」（The Agony of Modernization）一節中，固備述現代化的困境，分析種種外顯的惡果與潛在的隱憂，從人際疏離，人格否定，到自我迷失；從民族主義，羣衆運動到極權政治，現代化過程實同時具有創造性及毀滅性，故一再呼籲領導階層善做審愼的抉擇。但著者於比較各地區現代化過程之餘，仍爲人類的遠景描畫了一個可堪嚮往的藍圖，勾勒出樂觀的線索。基於演化論觀念，著者雖然認爲，展望現代化終極的大同社會時，必需認識的一點是，歷史的經驗尙未提供任何事實，可以指出大同社會將以何種形式出現。歷史的傳統包袱誠難遽予拋脫，人類却絕非歷史的俘虜。以往衆多危難關頭中，個人或羣體的領導人物，均曾發揮過關鍵性的力量。新的世界觀正日漸形成中，而先進社會相互依賴的結果，將是世界性的整合。產生新整合的動機將會與導致建立民族國家的原因相同。按照邏輯推理，在新世界裏，各國仍會繼續現在正進行的政治現代化活動。國際整合最主要的動機應是想爲所有公民提供更好的經濟成長的環境，更大的市場，更多的資源與技術的交流，並更能防止現行國家制度中的政治與經濟的不穩定（頁一四七至一四九）。著者於此提出了國際整合的三項途徑，亦卽三種類型：國家的、地域的、國際的，都將增進社會相互依賴的程度，最後達到國際整合的境界。而領導階層對於國際行

動的參與熱誠和實際表現，將是實現國際整合的最大動力。

本書第七章詳附現代化研究書目，多達二百種，並分別加以提要評介，是一篇極具參考價值的論文，足供深入探索者啓引門徑。自承受第一次世界大戰衝擊之後，許多專業歷史家著作的世界歷史，至近年許多比較各社會不同階段之現代化變遷的論著，著者均有扼要的論列。著者惋惜地指出，社會科學家曾在社會變遷的研究上，做了某些深刻有趣的貢獻，但歷史學家却尚未就這些貢獻做過充分的試驗。他以帕森思（Talcott Parsons）的「行動之理論」（Theory of Action）爲例，認爲對歷史學家而言，此一理論雖是極其抽象的，因爲歷史學家僅習慣於簡單的二分法，如安定與改變，或改革與反動等。然而此一理論首次完全考慮到人格、文化、社會、社會有機體之相互關係，並且也考慮到影響人類態度之模式變數，此一理論在某些方面可以顯現極其複雜的事實，而歷史學家熟悉此一事實，却爲此事實所困惑。理論的歷史固常有過份簡化之嫌，然而任何尋求對複雜性加以適當衡量的理論，都應得到歷史家同情的考慮。對於社會結構及變遷的複雜性，採取整體的研究方法，本爲人類學以及較近的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此種研究方法引起了對於科際整合的興趣。歷史論著的中心主題是，從許多相關的事實中創設出一種模式，不論此一模式是敍述性的或是解析性的，亦不論是地域性的或一般性的。歷史論著的問題越來越複雜，因爲歷史知識不斷累積，而相干的社會科學論著日益增多，亦日益艱深。專業歷史學家的興趣，從對於政治演變的關切，擴展到對於經濟社會制度的廣泛的關切，故本世紀以來，許多歷史家乃努力推動史學內各科的整合，以及歷史與其他相關科目之間的整合。

㈤

本書以現代政治學眼光研究近代歷史變遷，分析世界上一百七十五個獨立或非獨立國家，經由社會整合而從傳統生活方式轉變到高度現代化的過程，論題所涉範圍至廣，自不免偶有粗疏之處。評者擬就思慮片斷所及，略抒固陋，商榷於著者與讀者。

一、史觀方面，本書似未超脫泛政治論的範疇。著者觀念，深受十九世紀政治

史家的影響，對民族國家的形成特感興趣，而低估了技術變革中，生態學上的特性。著者固曾述及現代化的變遷動力，乃是以科學知識爲基礎的技術生產的轉變，但他未深入探究這一轉變的原始過程及其歷史本質。究竟現代化是如何開始的？我們通讀本書，對此項問題，並未能得到清晰的理解，彌感困惑。著者談到民族國家，但事實上，近代以前的民族國家，對現代化的起源，並未具有任何意義。又著者極端漠視近代宗教改革運動的歷史地位，而一味强調政治領導階層的重要性，此點亦值得商榷。徵諸近代歷史事實，某些國家推動現代化，並不需要政治領導階層，或僅需很少的領導人物而已，如北歐諸國。又有某些國家，有其推動現代化的領導階層，但現代化運動迄未成功，中國卽爲明顯的一例證。至於宗教運動對現代化改革的重大意義，尤不可忽略。韋伯（M. Weber）在其「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04–05）一書中對勞動信仰與成就需要的深刻的理論解釋，是一般人所熟知的。而傳教運動的近代影響實不僅限於「資本主義精神」（spirit of capitalism）的形成。就此點言，我們的觀察恐不必捨近求遠。

由於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早就有理性主義論者與不可知論者的存在，故中國民族一向被認爲是非宗教的民族。而從淸末到民初，一序列反教運動的發展，更令人矚目。但我們只要平心探究中國近代史實，當能推求一項共同的結論，此卽中國現代化運動與宗教運動的密切相關。早期的改革運動，深受傳教士言論的影響。林樂知（Young J. Allen）刋行「萬國公報」，開創一項對中國時政批評與建議改革的先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華著書立說，僕僕於朝野之間，介紹新知，鼓吹變法；廣學會的組成及其活動，均有傳教士積極參預其中。這種改革精神的輸入及其廣遠的影響，從鄭觀應的「盛世宣言」至譚嗣同的「仁學」諸書，均有淸晰而深刻的脈絡可尋。教育爲社會文化的先導，傳教士遠履窮鄉僻壤，設學校、開醫院、成立慈善機構等，均值得注意。專供婦女使用的教會學校，首創於一八六〇年，爲男女平權運動開風氣之先。燕京、金陵、嶺南三所教會大學，其教育功能實足與國立大學相抗衡。而燕京、金陵尤培植了許多農經人才，從事近代鄉村自治與農村復興運動，極具貢獻。而鄉治運動中最著勞績的代表人物晏陽初與梁漱溟，均有其深刻的宗教背景，而晏陽初的平教運動，且曾獲得青年會（Y. M. C. A.）的有力支持。卽以著者所强調的現代化政治領導階層而言，中國近代革命家如洪秀全與孫中山先生等，均服膺基督教信仰。上述這些宗教運動的歷史內幕，無論從任何角度觀察，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均應佔據相當份量（參見K. C. Liu, Americans

and Chinese: A Historical Essay and A Bibliogra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3-22.)

二、本書論點，爲「伊力特主義」所充塞，評者亦不敢苟同。著者認爲歷史的轉變，其受領導人物的影響，只有領導者才能在緊急關頭決定有關整個國家的政策。領導者的意外死亡或因爲私人原因引退時，都可能在歷史的發展上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歷史上的重大政策，雖然並不完全依賴一位領導者的決定，參與決定者還有人民，但最後決定的權力仍操在領導者手中，由他的個性及行爲方式決定他的選擇，因此，這位具有決策權力的領導者的生與死，以及生活經驗所形成的性格，是決定歷史發展的關鍵，他的決定可能支配整個人民的命運達數百年之久（頁六十七）。這便是著者所信持的「伊力特主義」。這種「伊力特主義」的史觀，使人聯想到卡萊爾（Thomas Carlyle）在其「英雄與英雄崇拜」（Hero amd Hero's Worship）中的一段話：「照我看來， 普遍的歷史， 是人在這世界所完成的歷史。這個歷史，說到底層，是在這個世界上工作的偉大人物的歷史。」

探本溯源，「伊力特主義」的開山祖師是柏拉圖。柏拉圖認爲，只有「哲人王」（philospher-king）執政的國家才是合乎公道的。 這種極權的公道觀念的論旨是，只有智慧超人的伊力特，才能發現絕對的眞理，據此以爲統治的準繩。柏拉圖式的「伊力特主義」是傾向於極權的，這是關閉社會（the closed society） 的產物，因爲關閉社會是崇拜「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根據歷史主義，人類社會的命運，都照歷史的定律，在社會中沒有個人的地位，也就沒有個人努力奮鬪的餘地，因此形成了部落的觀念和階級制度的自然性。領袖理論、超人主義，皆由此而衍生。故卡爾波柏（K. R. Popper），在其「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書中，以十章篇幅，析論柏拉圖的學說及其生平而痛加抨擊。布拉克教授本人，固非極權主義論者，但本書中心思想，顯然殘存着十九世紀「伊力特主義」的意理。伊力特統治是十九世紀歐洲的政治信條，包括卡萊爾（Thomas Carlyle）的「英雄崇拜」論，尼采（Nietzsche）的「超人」論，韋伯（Max Weber）的「奇士瑪」（Charisma）論，以及對莫斯卡（Moslca）、巴瑞圖（Pareto）、巴克赫特（Burckhardt） 諸人的學說的浪漫式的研究。

這些觀念表示許多不同的企圖，想復興古代的社會階級觀念，阻礙民主觀念的傳播。因為「伊力特主義」的觀念與民主政治的觀念是對立的。伊力特主義認為個人天賦不平等說，與民主思想所强調的凡人皆平等的觀念相反；而統治者為少數人的觀念與民主的「多數統治」(majority rule)的觀念是衝突的(參見T. B. Bottomore, Elites and Society, New York, 1964)。評者認為，全民政治為人類歷史傳統所追求的一項偉大理想，亦應為現代化的理論取向之一，故著者論現代化，似不應再信持「伊力特主義」。且就歷史研究而言，「伊力特主義」的史觀過份强調人類的自由意志與歷史事件的偶然性。他們認為天地的元氣，歷史的眞精神，往往表現在一、二特立獨行之士的身上，而否認社會與經濟等種種的變遷規律。如此史學家所得的結論，僅僅是相對的可能性，而沒有高度的、客觀的精確性。但是運用科學方法於史學研究，是近代史學的一項重大進步，所謂觀察法、分析法、歸納法、統計法，以及本書所主用的比較法，其應用均需以普遍的規律為基礎。這與「伊力特主義」的史觀，在某一角度看是背道而馳的。

本書另一個值得商榷的地方是分類法的應用缺乏統計論據的實證基礎。著者固根據座標架構 (frame of reference)，解釋大規模的歷史變動，然殊未根據其座標架構去尋求資料，以强化實證的基礎。故某些論點有流於玄思的概括觀念之嫌，遂使本書幾成一部導論性著作。故評者建議，著者於此書運用某些定量分析，以補充上述的缺憾。統計學之應用於社會人文科學，並不保證其證據謹嚴，但是精確的量化將導致觀察的釐淸，進而有助於知識的重鑄，故就基本的意義說，量化工作依然可稱為「定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 。本書第三章第三節及第四章第二節，著者分別研討了現代化的程序與類型，而提出「四階段論」與「七類型說」，這些理論的陳述都含蘊着重要性質的量化基礎，必需提供統計論據，但本書則未注意此一步驟，令人有空洞而缺乏實證之感，是方法論的一項缺陷。

另外，本書寫作的外部形式 (physical forms) ，亦有可批評之處。因為當代學術界的通例，較之前期論著所採用的形式，已更趨於精密，而且已成為眞正學者所普遍接受的一項原則。其具體辦法是：不僅應在論著中附加小註時，力求完備詳確，對於所引原書的著者、書名、出版地點、出版年代，引文頁次等，甚至對於正文的有關說明，在第一次出現該書時，亦均有一定的表達方式。另在引用前人在各

期刊發表的研究論文時，情形亦然。這樣不只在積極方面可使論著趨於嚴謹化，爲讀者提供深入的，實證的探索門徑，在消極方面尤足防止輾轉抄襲或獨佔孤本資料壟斷研究的弊端。這在提高研究素質，推廣學術效用等方面，實在十分必要（參見李恩涵：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趨勢與必要參考書目，思與言，四卷五期，頁十八）。在這方面，評者必須指出本書並未依循此項學術規格，全書未見一個註解，使讀者沒有逐細覆核並據以評論的線索可尋，以深入探討或鑑定著者的眞實功力與見解。如本書頁八十四，著者認爲有很多文章討論「羣衆社會」（mass society），又有許多討論「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文章，且以此作多項推論和闡述；究竟著者所根據者是那些論文著作？讀者迫切需要參考而不可求，此種「鴛鴦繡取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的態度，評者認爲是本書一疵，亦違背了學術著作外部形式應有的規格通例。因此所引起的研讀不便的例子，本書中俯拾卽是。

於此，我們擬再指出本書某些立論角度，無論觀念的闡揚或事實的陳述，尙難超然客觀，而完全擺脫西方的本位主義。著者固强調現代化的「創始性」（originality），必需適應國情，但所做論斷，往往不免因襲今日西方學者的錯誤看法。如討論先進社會國民平均所得爲八百至二千五百美元，而約佔全世界總人口一半的二十五個最落後國家，其國民平均所得不足一百美元（頁二〇）。如此則其生活水準當相差八倍至二十五倍以上。這種估計幾乎漠視了各國貨幣的外滙率與其本國的購買力不相稱的事實。又如著者將民主政治譬喻作汽車與噴射式引擎，從而推論民主政治當然可實行於西方以外的社會（頁一四〇）。這種見解把有機的制度與無機的器物混爲一談，且顯然忽略了文化傳統，社會背景與經濟發展的個別差異，而承染了「西化」或「歐化」的語調，與本書「現代化」的基本理論旨趣是不相配合的。

其他如史實方面某些細節，亦自有見仁見智之處。例如本書頁一二三，稱中國北伐之役爲一種革命，實際上此革命乃繼承辛亥革命之餘緒而發揚光大者。又如頁一二三，認爲中國是古老而成熟的舊社會，但却最難接受現代化。最可能的原因是，國內政治及學術界的領導人物都認爲傳統的眞理是對的，因此不能拋棄。直到一九〇五年才廢除科擧，以新式知識作爲進身之階。甚至在今天，多數中國領導者還保留「中國本位的世界觀」。評者認爲此一論斷是不符事實的。中國近代許多有力

的學術領導者均信持中西文化折衷調和論，甚至傾向西化論者亦不乏其人。而崇洋心理之瀰漫，亦足以反證著者論斷之偏失。

㈥

國人集體注意到現代化問題，似可遠溯到晚清時代，直迄民國廿四年前後，國內學界曾有中國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的論爭，其後輯刊成「中國本位文化討論集」等書。從「五四」至「三十年代」，中國知識界通行的名詞爲「西化」(Westernization) 與「歐化」(Europeanization)。此等名詞乃意味先進國家對落後國家的衝擊和影響。稍後又有「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都市化」(Urbanization) 等名詞，其概念僅側重於工業革命後引起之社會經濟轉變。至於「基督化」(Christinization) 與「美國化」(Americanization) 等名詞所代表之歷史意義，更屬一偏之見了。上述諸名詞均未能表達現代化過程之複雜性與全面性。至四十年代，另一種嶄新的、清晰的概念產生了。「現代性」(modernity) 一詞漸被通用，以意指幾個在科學、技術、政治、經濟和社會上進步的國家所具有的共同特性而言，而達到此進步境界之過程即爲「現代化」(Modernization)。此一現代化觀念，直迄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逐漸導入中國知識領域，而引起廣泛的注意和討論。然學界譯介這一類著作者仍屬鳳毛麟角。縱觀現代化的研究趨勢，一則重視科際整合之綜合分析，以代替舊日哲理性的敍述；二則兼重世界各國區域性的現代化過程，而不偏重歐美高度開發國家現代化過程的研究；三則其研究史觀，漸切實際，多以加速現代化過程，爲終極目標。但現代化的研究工作極爲浩瀚，在許多重要問題上還缺乏足够的資料，大部份的歷史學者又少具備深入探究的訓練和見解。此類研究迄目前仍然只是一個開始，而其結論則又關係到人類命運如此深鉅，我們殊應寄予嚴肅的關切。評者介紹布拉克教授其人及其著作，其寓意在此。

六十一・六・二十四・